

忆 鲁 迅

茅盾 巴金等著



忆 鲁 迅

茅盾 巴金等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出版说明

本书据一九五六年十月初版本重新排印。各篇大致按内容顺序编列。未署作者的注释均为编者所加。

忆 鲁 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湖北第3次印刷

印数 35,001—43,500

书号 10019·524

定价 0.53 元

目 次

鲁迅翁杂忆	夏丏尊(1)
忆鲁迅	沈尹默(5)
忆鲁迅先生	孙伏园(7)
怀念鲁迅先生	尚 钺(14)
在老虎尾巴	许钦文(31)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37)
鲁迅先生和青年	李霁野(45)
活在人类的心里	鲁 彦(56)
回忆鲁迅先生	陈学昭(59)
初次见鲁迅先生	马 珏(66)
从厦门解放引起的感想	罗常培(69)
纪念鲁迅先生	茅 盾(73)
鲁迅先生的演讲	郑伯奇(76)
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川 岛(80)
“开会”之于鲁迅	丁 玲(90)
忆鲁迅先生	李 兰(93)
悼鲁迅先生	艾 芜(95)
一面	阿 累(97)

忆鲁迅先生	以 群(102)
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	陆万美(109)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巴 金(123)
记鲁迅先生	唐 弢(129)
鲁迅先生与《译文》	黄 源(139)
要学习的工作精神	丽 尼(151)
难忘的会见	白 危(153)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曹 白(159)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176)

鲁迅翁杂忆

夏丏尊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彡”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

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以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学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学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了，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他都一一说给他们听。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甚么了，不过对于年青的妇

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
人间味。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忆 鲁 迅

沈尹默

第一回和豫才见面，已经记不清楚，大约是辛亥革命后，我住在杭州的时候。那时从日本归国有一批人，都到了杭州，如幼渔，逖先，玄同，百年，蓬仙，豫才，启明，季市，仰先等人，他们是在东京智度寺与兼士同听章太炎先生讲学的一群朋友，兼弟也是那时候回来的，因他的缘故，这一班人先后都认识了。

一九一三年二月，这年是癸丑，我应北京大学预科文史教员之聘，同朱逖先戴螺髻结伴北上，豫才他先我一年壬子就到了教育部任社会司科长，那时教育总长是蔡元培。豫才寓所在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我初到北京时住在敷家坑海昌会馆，两处都在宣武门外，相去不远，得闲时常相往还。我不善于谈天，却有耐性听人谈天，豫才的话不甚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时候要笑一两声，他的笑声是很够引人注意的。玄同形容他神似猫头鹰，这正是他不言不笑时凝寂的写真。

他住在会馆一个小偏院里，有两三间小屋，书案向着一扇方格糊纸的窗子。有一次，我发现窗纸上，有一个胖而且

大的壁虎，很驯熟的样子，见人来了也不逃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喂养着的，每天都要给它稀饭吃。右手墙上挂着一个篾条弯的小弓，他说是用来从窗缝里射那些正在院子小门边墙角小便的人们的，我常常想这个暗箭，究竟能够不能够伤人，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向住在会馆中的绍兴同乡们一问。由这种地方看去，可以了解他平生对于人物的爱和憎。他是老于世故的，所以不喜欢世路人，尤其时常要讽刺那象东吉祥派的一班正人君子们，但是对于单纯的青年学子，却很肯推诚相与。

一九三二年，我从北京移居上海环龙路，豫才也住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相离实在太远，几乎断绝往来，有一次，他和他的三弟建人约我到四马路一家中国式番菜馆晚餐，仿佛广平也在座，同席的姓名却一个都记不起了，所谈何事，也全忘记了。自此以后，只有读到他的文章的机会，就没有再见面一面的机会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

忆鲁迅先生

孙伏园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县得到。十月二十日的下午三点钟，我被零碎事情缠绕得还没有看当天的北平报，多承一个朋友跑来告我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没有做一点工作，心头想的，口头说的，无非鲁迅先生。我没有哭。我本来不敏感，后来学镇定，最后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就成了麻木。但我觉得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我回忆到二十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1911)，我十八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

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教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着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直到现在二十五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觉得没有能副鲁迅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不久辞了校长。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交代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钱；也从旁处听见军政府如何欠付学款，及鲁迅先生如何辛苦撑持。那时候一切都混乱，青年们发现了革命党里也有坏人，给予简单的头脑一个不期待的打击。对于旧势力的抬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继任鲁迅先生作校长的，正如继任孙中山先生作总统的：这个对比，全国各地，无论上下，都极普遍。欠付学款的军政府，因为种种措施不妥，后来成了全绍兴攻击的目标，旧势力找到革命党的罅隙，乘机竭力的挣扎出来。青年们一般的陷入苦闷，我也不再进那个学校。

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

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过外面虽然现着异常孤冷，鲁迅先生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例如向金陵佛经流通处捐资刻《百喻经》，又如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这种不含丝毫名利观念的提倡文化事业，甚至一切事业，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甚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

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尝为门徒洗脚，我总爱记起这个故事。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他从未沾染丝毫。他平常只穿旧布衣，象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
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
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
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
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
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
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
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
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
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
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同鲁迅
先生去看，李老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
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
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老先生的态度这才
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
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
Spy^①，某人是Traitor^②，一个不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
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
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
古道热肠的。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

① 英语，意为密探。

② 英语，意为叛徒。

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的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象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却，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和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纪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